

# 铜文化论坛

疏仁华 刘静◎主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铜陵学院铜文化创意协同创新中心

省级铜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名师工作室项目

省级卓越设计教育培养计划——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资助

省级特色专业（广告学）、省级广告学教学团队——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资助

# 铜文化论坛

TONGWENHUA LUNTAN

疏仁华 刘静◎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文化论坛/疏仁华, 刘静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396-6007-3

I. ①铜… II. ①疏… ②刘… III. ①地方文化 - 铜陵 -  
文集 IV. ①G127.54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3340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宋潇婧

装帧设计: 褚 琦

---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9.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生产工具的变革往往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原始人利用大自然现成的材料,如石头、树干、骨头等,经过简单加工,制成各种工具和武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与动物一样融合在大自然之中,是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自然人”,因此,这个时代被称为“石器时代”。当人们认识金属铜后,便开始从含铜的矿石中提取铜材,制造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武器。这些青铜工具的出现,不仅改变着人类从事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所以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

我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终止于公元前 5 世纪,大体相当于历史纪年的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历时 1500 年左右。这一时代盛产了大量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数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的总和;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种类,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土青铜器种类的总和。从现在出土的青铜器看,其分布之广,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艺精湛,造型雄浑古朴,纹饰绚丽精美。从功用上看,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从纹饰上看,有龙纹、凤鸟纹、波纹、云纹、饕餮纹、文字装饰等。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夏代时,统治

者逐渐赋予青铜器强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社会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反映了夏代的社会制度日臻成熟。《史记·封禅书》:“(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皆尝亨觶上帝鬼神。”禹铸九鼎,利用巫术、宗教的力量使鼎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到商代,青铜礼器继续被权力化、制度化、神秘化的同时,得以在统治阶层的社会生活中更广泛地利用,尤其是青铜礼器十分发达,中国青铜文化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西周时期,青铜器被看成是礼乐制度的“代名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春秋中期,周王室衰落,诸侯纷纷自铸青铜礼器以显权势。战国末期,随着铁器的出现,青铜文明开始走向衰落,唯剩下铜镜和铜币还在漫长的岁月里孤独前行,但铜镜、铜币继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铜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使用青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而言,一是指青铜器、青铜采冶遗址、墓葬等物质形态;二是指青铜器具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如文字、文学艺术、社会礼乐制度等。所以,青铜器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审美等密切相关,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铜陵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古代铜矿冶规模宏大,一直是中国采铜、炼铜的中心。通过考古发掘,该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几乎与中原地区同步。目前已发现的矿冶遗址近百处,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铜陵全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铜官山、凤凰山、狮子山、金山和铜山等矿区,各自形成当时的矿冶中心。其时间跨度,上至商周,下至唐宋,开采、冶炼、铸造延续长达 2000 多年。正因为古代铜陵的矿冶业规模宏大,地位显著,自秦汉至唐宋的历代朝廷都对铜陵地区给予高度重视。西汉设铜官;东汉设置铜官镇;齐梁置梅根冶;唐设义安县,并派驻梅根提督太监;南唐封铜官山为利国山;北宋置永丰监;南宋以后,由于地表铜矿资源枯竭,并采技术条件所限,场监俱废。此地大规模采冶铸钱活动基本停止。

时至现代,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落户铜陵,新中国的第一炉铜水浇

出了第一块合格的铜锭,使得铜陵的铜采冶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铜陵有色金属企业的不断壮大,第一支铜业股票发自铜陵,铜陵的铜经济和铜文化得到了迅猛地发展,成为当下中国重要的铜工业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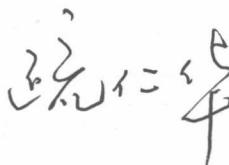
悠久的古采冶铜历史和辉煌的现代铜工业一起构成了今日“中国古铜都”——铜陵厚重的文化根基。20世纪90年代初,敢想、敢干的铜陵人就开始尝试开发铜文化资源。1992年,铜陵市政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以青铜文化为突破口,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铜陵)青铜文化博览会。截止到2016年底,已成功举办了13届。经过20多年的积淀,青铜博览会将被打造成“文化的盛会、经济的平台、城市的名片、群众的节日”,已经成为世界认识铜陵的一扇窗口。为了深入理论研究,拓展青铜文化内涵,打响青铜文化品牌,铜陵市先后举办了8次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借助这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专家学者们展开深层次的交流探讨,发布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把铜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为铜陵打造“世界铜都”、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注入新的活力。

明代诗人李日新《金带山》诗云:“千年宝气光霄汉,莫说铜官只有铜。”“千年宝气”就是铜陵几千年来沉积的文化之气,这是铜陵城市之魂,是铜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铜陵的铜文化需要创造、继承、积淀、彰显和传播。通过带有创造性的想象和设计,城市的建设者们将各种铜文化元素链接到各种器物、造型或空间上,两相结合,化虚为实,借助这些有形的文化符号,彰显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当年的《青铜壁》《起舞》等一批城市铜雕塑建成之后,让人耳目一新。而如今,通衢大道、街头公园、居民小区……一个个城市铜雕塑点缀其间,成为古铜都之精魂!这座城市的精神已经被浓缩在一个个城市铜雕上。

“抓住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敢想、敢干的铜陵人跳出依赖铜材质、依赖铜雕塑的思维框框,尝试用更多的载体展现更多的铜文化元素与文化内容。以城市人行道板砖为载体,展示铜钱等系列图案,使铜陵城市人行道砖成为别具特色的“铜陵地砖”;以城市道路灌木绿化、城市边

坡为载体,修剪出青铜器造型或图案,打造“铜陵造型”;有选择性地以城市建筑为载体,以青铜器各种纹饰为内外装饰线条,勾勒“铜陵线条”……让青铜文化深深烙刻在每个铜陵人的灵魂深处,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铜陵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作为铜陵市唯一一所省属本科院校,铜陵学院服务地方,积极响应铜陵市“弘扬铜文化,发展铜经济”的发展战略,为传承地域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出谋划策。2013年,学校联合相关单位组建铜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对铜文化的发掘、研究与传播,先后主办了铜文化学术研讨会,承担了《铜陵铜文化史》《在文化旅游背景下的铜陵铜工艺品创新设计研究》《铜文化创意名师工作室》等多个项目的建设与研究,一些研究者相继出版了《铜陵铜文化史》《铜陵铜雕塑》《铜陵铜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铜文化论坛》一书则是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者们新近对青铜文化、铜艺术、铜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希望通过这些点滴的思考和不懈的探索,继续为铜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016年12月28日于铜陵文景大厦

# 目 录

## 铜文化

“矿脉”与“龙脉”的冲突

——兼论明清皖南地区矿石开采中的“风水观”

疏仁华 柯志强 / 003

中国设计艺术思想新论

——麦克卢汉视角下的中国三代青铜器 孙洪伟 / 014

人性的解放——解读汉代青铜器的美学思想 刘 静 / 023

皖江铜文化的景观艺术表征研究 徐 争 疏仁华 / 032

## 铜艺术设计

“有意味的形式”:公共铜雕艺术的形式语言研究

——以中国铜陵国际铜雕艺术展为例 刘和琴 / 043

铜文化艺术衍生品设计研究 王梦莹 / 052

基于场所精神的城市公共铜雕艺术研究 张璐璐 / 062

浅析古代青铜器纹饰的线性特征 王带平 / 068

## 铜文化传播

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业发展探究

——以铜陵市为例 钱 敏 疏仁华 / 077

现代铜工艺品设计与地域文化特性研究 黄 俊 / 085

- 铜陵铜文化品牌建设现状及推广策略研究 陈书杰 / 092  
基于铜陵地域文化的铜艺旅游商品再设计研究 董琪珺 康英 / 098  
媒体新生态下的铜陵铜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谢雅玲 / 105

### 铜文化传承与创新

- 铜陵铜文化产业创意发展的提升路径与方法选择  
杨龙飞 疏仁华 黎泽潮 / 117  
传统青铜器的当代价值研究 陈利斌 / 126  
浅谈青铜纹饰与现代造型的融合 王带平 / 133  
铜陵铜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章瑞 / 139



铜文化



# “矿脉”与“龙脉”的冲突

## ——兼论明清皖南地区矿石开采中的“风水观”

疏仁华 柯志强①

**摘要:**明清皖南地区风水观念盛行。人们认为蕴藏于地下的“矿脉”不能轻易扰动,矿石的开采会伤害当地的“龙脉”,导致一些自然灾害甚至人文事业方面的衰败。“矿脉”与“龙脉”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态度。

**关键词:**皖南;矿业;矿脉;龙脉;风水观

皖南地区是指安徽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芜湖、宣城、马鞍山、铜陵、池州、黄山六市。皖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历史上这里曾创造了灿烂的矿冶文明,声名远播的“吴越金锡”“丹阳铜”“梅根冶”“永丰监”都与皖南有关<sup>[1]</sup>。但是,自宋代以后,皖南地区大规模的矿石开采活动就基本停止,学者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时多从资源枯竭的角度出发,认为宋代以后,皖南地区浅地层的铜矿、铁矿等资源开掘殆尽,由于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无法从开掘深度上进行突破,产量已十分有限,以致渐渐不受官府重视,并最终导致矿业的萎缩<sup>[2]</sup>。然而,在明清皖南的方志里,记载了大量以风水作为借口反对矿石开采的资料。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风水观念对皖南地区的矿业开发有着一定的影响。

① 基金项目:铜陵学院铜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重大招标课题“皖南铜矿开发与地方社会研究”(2013twhzd01)。

作者简介:疏仁华(1968— ),男,安徽枞阳人,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

柯志强(1983— ),男,安徽来安人,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

风水，亦有堪舆、形法、青囊、相宅、阴阳等多种别称。该词始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sup>[3]</sup>，故后人尊称郭璞为风水鼻祖。据《辞海》解释，它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sup>[4]</sup>。现代学者认为，风水是“人们确定阴宅、阳宅布局、朝向、营建，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居葬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技巧和术数”<sup>[5]</sup>。

风水思想经过晋代及其以后不断的演化和发展，在明清时期已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风水是一种超越人力的神秘力量，冥冥之中影响甚至主宰着人们的命运。由于人生多舛，世事无常，人们往往将吉凶祸福、利益得失乃至子孙繁衍、家族兴衰等都与风水相联系。所谓的风水宝地必须符合依山傍水、钟灵毓秀的地形条件，需要确定山川的主干即龙脉的气势所在以及曲折起伏的方向，经过察砂观水、寻龙认脉、点穴立向，才能找到真龙吉穴。而龙脉不仅主宰着这个地区人们的吉凶祸福，更关系着整个郡邑城乡的兴衰起落。因此，自古风水术就重视龙脉的谨慎维护，尽可能将其保持完整，非常忌讳随意的穿凿和破坏。

明清时期的皖南地区，原本“好巫尚鬼”的习俗就十分浓厚，大多数百姓出于祈福避灾的心理信奉各种巫鬼，以致许多百姓患病时往往不求医师而信巫师。他们认为生病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作祟，并为此祈祷斋醮，花费无数。如广德州的百姓“俗信巫而尚鬼”<sup>[6]</sup>，“疾不信医而信巫，祷祀斋醮，不惜所费”<sup>[7]</sup>。而太平府之风俗亦是“尚鬼神而不医”，“病者先即许鸣锣酬愿，故神像出则锣声数百……饮食靡费，金钱更复无算”<sup>[8]</sup>。在这种氛围下，风水观念得以广泛传播，也深深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人们崇尚风水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择地、埋葬、祭祀等等。当地百姓特别重视祖先坟墓的风水，为了获得祖先的庇护，子孙有责任和义务寻找风水福地。因此，在宁国府，很多百姓拘泥于堪舆家

之言，亲人死后并不及时归葬，只为“以待吉地”<sup>[9]</sup>。南陵县则崇尚占卜，有“山占、树占、旦占、杯占”<sup>[10]</sup>等多种形式。歙县的赛神会更是自明代即有，每年举行，“岁糜巨赀”<sup>[11]</sup>。

皖南地区多山，可谓群山连绵，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百姓对山都有着特殊的敬畏之情。每年都有官员带领百姓祭祀山神的习俗，祭祀之前官员必先斋戒，祭祀当天身着朝服并率领所属出行，非常隆重。如广德州“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先期致斋三日，不理刑名。届期知州穿朝服会同都司各率其属，诣南门外恭祭”<sup>[12]</sup>。地方官民的重视，使得以相地堪舆为业的风水先生得以大行其道。嘉庆《太平县志》中就专门记载风水先生的事迹，“奚月川，善堪舆，本乡及桂城诸里阴阳宅皆其所定，迄今族大人稠，科第蝉联，人推为吴宽、张宗道之亚。”<sup>[13]</sup>类似的事例在皖南地方志中记载颇多，不可胜数。

## 二

明清时期皖南地区风水观念兴盛，人们认为蕴藏于地下的“矿脉”不能轻易扰动，矿石的开采会伤害当地的“龙脉”，导致一些自然灾难甚至人文事业方面的衰败。每当皖南地方出现各种灾异现象或者科举事业裹足不前之时，当地一些百姓总会将这些原因归咎于凿石开矿破坏了风水，以致灾难不断，科举不兴。

明天启六年（1626年），繁昌县出现大火，时人形容“刷石斲桥，满城妖火，衣笥书箧，空房隙地，不薪而焰，若有鬼物凭之，居民震骇，延烧数十余家”，而论及原因时，“说者以为凿石之应”<sup>[14]</sup>。

在广德州，由于开窑烧砖，致使州治龙脉受伤，火灾不断，“去年十字街失火，连烧十数家，今年东街及州署首又复失火一次，堪舆之言似属信而有征。”<sup>[15]</sup>

宣城的横山是府治龙脉，当时的一些无籍之徒“不招自集”，在此“开井烧灰，无日无之”<sup>[16]</sup>，虽然官府勒石严禁，但这些人阳奉阴违，以致“顺治七年，横山石崩，声震百里，俄而鳌峰告陷，俄而西城覆陷，铜钟鸣而铜

山崩”<sup>[17]</sup>。

时人认为,龙脉不仅关系地方灾祥,还关乎地方人文的兴衰,影响科举事业。广德州在“明代及本朝国初科第不绝,文风尚有,可观百余年来风水无人培植,学校日就衰微”<sup>[18]</sup>,经过查访,科举不兴是有原因的,“朱家店、河图庙、骆潘村等处因有关州治丁巽等方风水,向不准起土开窑,近来该处开挖砖瓦缸窑多座,有伤龙脉,以致学校衰微。”<sup>[19]</sup>明清两朝,由于应试士子的科举成绩影响着地方官员的政绩,在一些科举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官僚和主管儒学教育的教官往往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而对于热衷于功名的士子而言,科考更是关乎他们的前程,与其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被认为破坏当地风水而影响科举成绩的行为都要被禁止。

芜湖和宣城方志中有此类事例。明嘉靖年间,地方官员许用中、邵稷与芜湖诸生讨论当地科举事业不如往昔,诸生就认为这是县邑东南大荆山的风水遭到破坏的缘故。“大荆山……实为邑庠文笔峰也……又曰贵人峰。”<sup>[20]</sup>“往山未凿时,风气充郁,钟灵毓淑,”<sup>[21]</sup>自从成化年以后,有人肆意采掘,使得大荆山多处“皆堑为坑谷,削为坡陀,所谓左龟右鹤漫无遗址,用是形胜日亏,人文索寞。”<sup>[22]</sup>后来许、邵两官员捐俸十余金,众人也纷纷慷慨捐钱,得数百金,以换取凿山者停止采矿,而在“荆山息壤”后,当地士子敖子铨就在京闱中夺魁。<sup>[23]</sup>

无独有偶,在宣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据邑人钟声《宁郡龙脉纪事》载,当地采矿屡禁不绝,伤及龙脉,破坏风水,以致明万历之后科举不兴。康熙十年(1671年),县令邓俸买幞头山为官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县令薛又捐俸买碑二十八座,使十里内之处处有禁碑。在对采矿活动禁止后,不久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邓公时则孙卓、茆荐馨两先生同榜鼎甲,施愚山、高遗山两先生同登鸿博,薛公时丰年屡庆,梅桐崖、阮澄江两先生晋秩上卿,而两公亦俱任满升迁,”<sup>[24]</sup>钟声连连感叹,“风水之说岂真不足凭乎?”<sup>[25]</sup>之后,他又进一步论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太守佟二楼公允绅士之请,填补南门外一带沿河土脉,一醒未久,即

有入翰林者,有发解者,有联捷南宫者,有一岁成三进士者,有位陟臬司大中丞者。”<sup>[26]</sup>据此,他认为“居官得贤守令,关心地脉,挽回气数于地方,功非小。”<sup>[27]</sup>

### 三

由于开采矿石的行为被认为会破坏龙脉风水,危害地方,往往遭到民间反对。由普通民众、地方士绅、乡村宗族和公社等组成的民间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向地方官府施压,而官府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地方秩序,也会支持民间的诉求。于是,皖南地区民间力量和地方官府一起,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开采矿石的行为,以保护“龙脉”,培育风水。

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异常突出,皖南山区出现大量外来人口即所谓的“棚民”,他们四处开矿,凿伤龙脉,破坏风水。当地乡民不堪其扰,屡次向官府申诉,要求予以封禁惩处。地处徽州西南的黟县,“四面皆山,山多产煤”<sup>[28]</sup>,大批“棚民”来此开发。乾隆年间,江西窑民邹国仲在芙蓉障下租地“造窑烧砖”,而此处正是“县龙正身”。于是,黟县的士绅便联合起来向时任知县顾学治申诉,称邹国仲烧砖造窑是“火灼龙脉”,伤害“一邑县龙”。为此,官府逮捕邹国仲,拆毁其窑场,彻底“除去烧挖县龙祸根”。为了避免日后再有开采者重蹈前辙,危害“县龙”,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顾学治还颁布谕令《保县龙脉示》,规定“严禁县龙自发脉以至入首,……俱永远毋许开挖害凿石土,”<sup>[29]</sup>违者“从重究处”。然而,官府的严惩并未阻挡住棚民的开矿行为,嘉庆至道光年间,又“有异民胡载阳潜入境内,勾串租山,挖煤烧灰,逐为利薮,继复有异民汪灶贵、汪观华等互来开挖”<sup>[30]</sup>,“挖煤之人皆非土著,恃众横行则有害于附近之村落,就山起窑,任意肆挖,罔顾风水”<sup>[31]</sup>。为驱逐棚民,保护地脉,黟县监生舒镛、吴洪、许俊,举人何瑞龙以及44家宗族祠堂等联名向地方官府控诉。为此,嘉庆十年(1805年),黟县官府颁《禁水口烧煤示》;嘉庆十六年(1811年),颁布《禁开煤烧灰示》,认为当地环境优美,百姓安居乐业,民风纯良,“皆由地气完固”,而开窑采煤后,“山多被凿,地脉重

伤，甚或开挖之处逼近坟茔，更于土俗风水有碍。”<sup>[32]</sup>不仅如此，黟县六都各姓还开出桃源洞、潘山、百家山、鼠山、巷竿山、庵堂基等四十处山头土名，请求官府予以封禁，“惟细小土名甚多，恐未能尽行开出，总请凡产煤之山场，无论公业、私业，统禁开挖。”<sup>[33]</sup>泾县烟石岭被窑户私自开矿时，该县左暄、张履元等28名绅士亦向官府告发，言辞称烟石岭“系县治来龙”，“来脉实为县基之近祖，其山中落北趋叠嶂纷驰，层峦簇拥，既为钟灵之所，宜深培本之思”，为使“龙脉不致伤残，县基得以巩固”，请求官府阻止“挖土烧钢”的行为，并勒石永远封禁。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民间私人盗矿的现象，许多地区的百姓甚至情愿将宗族山场输公，交由官府统一管理。在繁昌县，“荻镇脉向被窑户采石炼灰，合镇受害，今刘宾臣捐山入公，永禁开采，保护风水，大有裨益。”<sup>[34]</sup>在泾县，乾隆年间，“程元凤、程天锡等愿将自己该股山业永助与合邑众姓名下，永远封禁，不再挖土烧窑，致伤龙脉。”<sup>[35]</sup>道光五年九月二十日，郑鸣皋、郑中立、郑大庆等，“将自己该股本山（烟石岭）凡有系龙脉地方，概行永远封禁，不得挖土烧窑。”<sup>[36]</sup>在黟县，武生吴彪、监生吴廷汝等“共知挖煤之害，愿将巷竿山以及毗连示禁等处之山查明字号税粮输入碧阳书院，收税完粮以为公业，可永保护”<sup>[37]</sup>。有些地方官甚至自愿捐俸以将山场充公。康熙十五年，宣城知县邓性将幞头山买为官山，“严禁掘烧，自为记勒石”<sup>[38]</sup>。

明清时期的皖南，类似黟县、泾县等地官府因重视当地龙脉，保护风水而封禁山场，禁止采矿的例子并不少见。根据皖南地方志的记载，制成下表。

地点	时间	主事者	禁矿原因	禁示内容	资料来源
繁昌县 峨山	明天启六年 (1626年)	知县刘源	满城妖火，说者以为凿石之应。	峨山之石，永不可开，特立严禁，以消民灾。	《道光繁昌县志·山川》，23页
贵池漫头山	崇祯十年 (1637年)	知县田瑞龙	“奸民”盗开。	奉安池太道史公可法立碑永禁	《光绪贵池县志·舆地志·山川》，63页